

02

寶坻文史資料選輯

第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宝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宝坻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宝坻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6年12月

封面题字 启 功

封面设计 杨普年

宝坻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编辑者：宝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地址：宝坻县城内广川街5号）

印刷者：天津市宝坻县第四印刷厂

津新出图字（96）第0066864号



又见老乡亲

杨朴年摄于一九九一年

1976 年地震后，北京军区后勤部医院赶赴灾区救援，在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镇驻扎，图为该院医生为小伤员扎小辫。

鱼水情深

杨朴年摄影



目 录

我是农民的子孙	浩 然 (1)
回顾我的创作生涯	刘秉荣 (28)
我与剪纸艺术	申沛农 (52)
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金宝环	张宝年 (66)
从参军到参加第一次空爆核试验	孙兴富 (80)
回忆大白庄地震和救灾情况	周源泉 (91)
往事如昨 历历在目	于林方 (98)
师生携手 抗震救灾	张桂敏 (102)
在带领医疗队救灾的日子里	徐洪志 (106)
《宝坻农民报》、《宝坻日报》创刊、停办始末	肖凤翔 (112)
宝坻县广播站的建立	杨云飞 唐乃亭 (116)
周杨同志来宝坻文化馆记实	王光亚 (119)
做追求艺术的有心人	杨朴年 (121)
从参加革命到减租减息	高建新 (130)
往事漫忆	刘存文 (135)

EA35/35

大钟庄洼地的开发和农场筹建	李伯辉 (144)
宝坻光荣院	杨昆林 (148)
天津建明五金厂迁宝前后	宗贵祥 (155)
引滦工程尔王庄管理处组建前后	刘乃基 (159)
宝坻民俗风物杂谈	赵耀华 (166)
小资料 刘将军墓	李寿祥 (173)
编后	(177)

我是农民的子孙

浩然

—

我原名梁金广，是个农民的后代。祖籍在天津市宝坻县城北单家庄。那地方低洼易涝，十年九灾。父亲不堪其苦，跟邻人结伴逃到唐山开滦煤矿赵各庄，下煤窑，做小买卖糊口谋生。妈妈怀着我、抱着我周岁的姐姐，寻找到矿区，一九三二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夜间，我就降生在赵各庄镇东南角上一个大粪场子的窝棚里。

我在操着河北、山东、山西等等语言的破产农民中间长到十来岁。熟视了井下归来的一张张油黑的脸孔、破烂的窑衣，闻惯了“锅伙”里的臭汗气味；对他们唉声叹气，卧病呻吟，酗酒，赌博，乃至打群架，也习以为常。在饥饿和枯燥的童年里，只有三件事情使我能够得于一点调剂：一是每周都有几个晚上跟住在大杂院戏班子的孩子混进燕春楼戏馆瞧“落子”（现在名叫评戏或评剧）；二是经常在早晨矿区门口，看抬出来的被砸死的矿工尸体、哭天嚎地的女人和小孩子；三是星期日奔向镇北一毛不长的岩石山上，登高眺望那烟雾弥漫的灰色旷野。

七、八岁的时候，很可能是父亲逝世前一两年，妈妈给我留起学生式的分头，做了一件尖领子的细布汗衫，缝制一个简单的

书包，就跟姐姐一起进了东街的教育馆小学。第一课是“天亮了”三个字，第二课长些是“弟弟妹妹快起来”。学校的地方特别小，只能算个四合院，没有操场。下课以后，狭窄的院子盛不下那么多顽皮，野性的孩子，全都涌到街上打闹。

我对上学没兴趣，热爱大自然，特别是山、河、绿树和野花；也想跟到处流浪的戏班子走，去过漫游的日子，学翻跟斗、耍枪棒。妈妈不依，“望子成龙”的心切，我和姐姐就把书包藏在同学家，结伙跑到东西无水庄，或水峪一些乡村玩个痛快。甚至步行到十几里路远的古冶，看长长的列车拉着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他们曾经引起我许多天真美妙的幻想，使我羡慕不已。

这样对付了三年，我刚刚念上六册的书，妈妈忽然雇了一辆顺路的破大车，拉上所有的破烂东西，然后让我和姐姐跟她一起爬到车顶上，慢慢悠悠地出发，往西，投奔二百多华里的蓟县王吉素村的舅父家。

二

我从穿了窑衣的破产农民中间出来，挤进那些故乡热土上挣扎活命的一伙农民群里。

这个小村庄地处冀东抗日根据地摇篮的盘山的西侧，以生产柿子、大枣而获得名气。它背靠山峦，怀抱平原，笔直的京榆公路翘首可望。三十来户人家，坐地户姓宋，占了一大半，其次是上一代从邻村迁来的吴姓族，剩下有四、五户杂姓，都是日本侵略军从山沟里赶赶出来的。南面蓟运河边青甸和太和两洼的财主们，在靠山地方买下柿林枣行，跟王吉素村的一些宋姓人“分

收”，使他们成了佃农。在村里挨门数，几乎没有一家不是长期工暂短地在四乡出卖劳动力的。他们勤劳安分，胆小怕事，逆来顺受，不沾“官派”，全都或真或假地信神信鬼。他们厚道，有时候又很狡狴；他们公正，有时候又自私得惊人；他们是心灵手巧的，又特别愚昧无知！他们对我心灵、精神方面的影响最为深刻，赐给我受用终生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直到今天，当我提笔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那一段生活素材积累的老本儿中，提取人物、语言和细节的“利息”。

妈妈是个有心计的妇女。她省吃俭用，辛苦操劳，过着叫花子般的生活，背着已经沾染赌博恶习的父亲，攒下几个钱。同时，不引人注意地分几次卖掉了宝坻县一点可怜的祖传遗产，尔后利用兵荒马乱、田产便宜之际，通过舅舅，在王吉素村买下几亩土地、一个小山沟和一间半房子。不是这样的话，两年后她也死去，我跟姐姐这两个孤儿该怎么活下去呢？

妈妈给我准备下在王吉素站住脚的条件，三郎寨山沟里长的青杏、红枣、黄柿子和五谷杂粮、涓细的泉水，搀拌着周围一伙善良农民的同情、帮扶，使我扎下了根。紧接着，又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风雨，滋润着我的幼嫩的心灵，终于催促着弱小的生命开了一朵小花、结出一颗小果实。因此，以后几十年中间，每次填写干部登记表，我都把“王吉素”三个字恭恭敬敬地放在“籍贯”一栏里。实实在在，王吉素小村，是我生命的故乡！

在妈妈卧病之前，她对我抱有的希望仍然不减，把我交给同村的吴希颜老先生，念了半年《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大学》和《中庸》等等。这个时候，我对读书识字有了兴致，可惜失去了可能。

妈妈死在我的怀里。她死了，我顶门立户过日子，我的童年也等于结束。

三

我得种地产粮糊口。我得赶集上店买卖。我还得出“官工”——给日本侵略者在北山根挖过壕沟，给汉奸队在白涧修过楼子。主要的，做为一个抗日游击区的少年，我得在稚嫩肩头上担起革命的担子。

开始我没有一丁点觉悟，只见老实正直的乡亲们都积极地干，就把“积极干”看成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的事了。

我家成了“堡垒户”，我站岗放哨，投递信件，护送伤病员。许多区干部的秘密会议，在我那间小小的屋子里召开。怕被人看到灯亮，我想出把自己的棉被挂在窗户上来遮挡光线的办法，如同春雨丝丝入地，耳濡目染的革命道理，争取解放的斗争现实，点点滴滴地渗进我的心田。从懂事起就崇拜忠心保国、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的我，此时，把每一个穿着二尺半灰褂子或挎着皮兜子，或打着绑腿的工作人员，都视为是真正的豪杰。我敬仰他们，热爱他们，动作、打扮也模仿他们；只要见着面，就象粘住一样，走了就难过，看不到就想念——我以最纯真的心追随他们！

穿了军装和工作服的农民们，对民族解放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能比的。我把那些撇家舍业、出生入死的庄稼人，当成共产党的化身。我认识到共产党的光荣和伟大，不是从书本上寻找到的

根据，而是当时死了的和活过来的英雄们用一点一点的实际行动告诉我的。这认识真实、牢固，从没因个人荣辱得失有过半分改变，至死也不会有！

一九四六年我当选为儿童团长，正式地开始了革命活动。我做过好事，也做过傻事和错事。例如，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我们儿童团和老头子包下村里的工作。有一次我带队押送公粮，赶驴驮的多是儿童团员。从家乡出发，绕行到盘山后背，又西进到密云，往返走了五六百华里。这一路上，天空有敌人的飞机不断扫射，陆地要过许多关卡，常在夜里急行，吃不到饭，喝不到水。我们不仅没有一个逃跑的，也没有一个叫苦、哭鼻子的。胜利完成这项任务，我受到区领导的表扬。接着搞扩军工作。怕得罪人又怕完不成任务挨批评的村长和中队长，背后教给我一个“计策”，让我出面，变相强迫地“动员”一个青年参军了。这个青年入伍不久负了伤，传说牺牲了，他妈就找我拚命。等到土地改革的时候，为这件事我受到报复，被当成土改的障碍给搬了“石头”。十五岁的一块“小石头”，在一间没一点烟火的小黑屋里被关押一天一夜，把我冻苦了。当时我光顾生气，没哭。为这件事我委屈了许多日子，私下里对我岳父发牢骚：从今以后要好好过日子，再不搞革命了。

就是这一年，即一九四七年农历的五月初十那日，我跟邻村刘吉素村长杨泽的女儿杨朴桥成亲。她比我大四岁，我是个“小女婿”。事有凑巧，那天傍晚，县大队突然开进村，区里的同志悄悄地通知我：部队这次来，要把白涧的伪军炮楼拿下来。我一听，高兴得跳脚。白涧在大道边，离我们村只有三华里，那边驻扎着

反动派，对我们生活、生产、工作都有很大的威胁和干扰。每次过大部队，我都要求他们帮我们拔掉这颗钉子，如今终于如愿，真痛快。我把这事跟村长说了，表示要亲自带担架上前线。他立刻摇头，表示：成亲入洞房，一辈子就一回，有天大的事情也不能离开家。我觉得他的话太可笑把主次颠倒了。况且，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入洞房哪有亲眼看着被自己仇视的炮楼子在炮火中倒塌更有吸引力呢？

我跑进屋里拿我那杆爱“拉稀”的破自来水钢笔，转身要往外走，一拉门拉不开，被倒锁上了。估计是村长给我姐姐传的信儿。由我姐姐锁了门。我说理、央告、喊叫，怎么也没有理我。这当儿，准备后续的部队开到，外村的担架队也集合在我家院子里。一个操外乡口音军人在院子里大发脾气：“乱弹琴，乱弹琴，村里连个管粮秣的人都没有！”我赶紧跳上炕，隔着窗户对他喊：“我就是管粮草的，快把我放出来！”大概又是村长向那军人说了实情，等好久不见开门，他却转回来，冲着窗户说：“这是老乡的风俗习惯，我们不能破坏。”我要挟他：不放出我去，你们就没有粮草用。一个好心肠的邻居出主意：让我在屋里开条子，从窗户递出去，由他们帮着到村公所领取。这时候天色大黑，开火的时刻将到，我不敢赌气，只好由着他们，点上灯，趴在窗台上开条子，撕一格子窗纸，一张一张地往外递。

事情刚办完，枪炮声顿时大作，震得整个屋子都颤抖。我有点发毛，估计我们还不曾见过彼此模样的新媳妇更会害怕。老人家早嘱咐过，新婚第一夜谁也不许说话，“谁先说话谁先死”。我们当然得“自觉”地遵守。到了最剧烈的时刻，枪子儿和炮弹头

仿佛飞进屋子。我赶紧溜到炕沿下边躲避。我的行动提醒了她吧？她也赶忙下炕，伏在炕沿的那一头。

由于我迷醉于革命工作，少有私心，在一九四八年六月里，被区上任命为全区年纪最小的一个村治安员；十一月一日，不满规定年龄，被区委直接秘密地吸收入党，我成了王吉素村的第一名共产党员。我当治安员的时候，正是“敌我拉锯”，斗争环境残酷阶段，为了安全，区、村干部都起个“化名”；我现在笔名“浩然”，就是从那个时期沿用下来的。

进关的解放大军包围着平、津的时候，区上把我抽出村，往前线方面押运公粮，接着调到县委党员训练班学习。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放假回家过春节，我向妻子宣布：从此要“不要家了”，到外地去搞革命工作。她哭了，低声说：“我提心吊胆，早知道得有这一天……”以后，我把这一天定为我的“脱产”日期。

四

由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在村、区、县、地这四级基层，当了八年从事实际工作的一般干部。从一个村，到一个区，再到一个县和地区，眼界逐渐扩大，政治思想水平也得到提高，同时还爱上了文学。

记得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里，县委把我从下乡的八区下营镇叫回县城，说为了培养我，决定送我到十四地委党校学习。于是，我背着小行李，步出县界，到党校所在地的平谷县，被安排住在南埝头村。不久，党校南移，我们又开到三河县城东沟、河边上的草桥。在大柳树荫里，地委宣传部的领导给我们讲授社会发展史，

头一次听到“从猿到人”这样令人惊异的题目。我过去一直认为人是玉皇大帝用黄土泥捏成的，听了这个新鲜的唯物主义的说法，多么惊奇，多么兴奋！下了课，我们就相互开玩笑，摸对方的屁股，看有没有尾巴根子。夜间我平生头一次失眠，想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是一些过去所不曾想过的新鲜问题。

这期间，我还生吞活剥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说实话，尽管书写得那么浅显，我却没有弄懂多少东西，然而，它使我对哲学问题产生了一点兴趣。一九五一年一年冬到省会保定市南刘庄省团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才使我跳出朦胧的境界，明明确确地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人要在中国大地上搞社会主义。一九五二年我在藁县涇溜（十区）任区团委书记，分工包一片村庄，跟村干部一起亲自动手搞社会主义。我所辖那片村子里，就有了一个在省委挂了号的安儿四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给党团员和干部办训练班，讲解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这样普通的话，在庄稼人的心目里，比诗美，比火炭热。我用自己年轻人的热情，在许多父老兄弟姐妹们的胸膛里点起火。我跟他们一块儿办起一大批互助组和不少的农业社。一九五三年秋天，调到通县地委党校不久，又带队到藁县侯家营区，主持三岔口等两个乡的“统购统销”运动。加上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一年到省团校学习前曾在杨津庄区、上仓区和下仓区搞互助合作、生产救灾的工作经历体会，便成了二十多年后写《金光大道》的基本素材的源泉。

千百名高大泉、朱铁汉式的基层干部教育了我。千百名刘祥、邓久宽式的普通农民教育了我。并非个别的象张金发那样的“党

员”，象冯少怀那样的农民，象沈家粮店的那种商人，也教育了我。我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农民，社会主义的兴起，已经救了农民。这在我的世界观中深深打下印记，直到今天；尽管几十年来我们的事业经过许多应当总结评价的成败和曲折，但我的信仰丝毫没有动摇过！

在一九四九年十四地委党校搬到三河县草桥不久，有一次我们拉着大队进城，跟地委机关的同志一起，挤到城边一座搭着席棚的大庙里听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我坐的地方紧靠边，无意中朝墙上看看。那上面还遗留着前不久教师训练班张贴的墙报，其中有几篇散文诗体的文章，吸引住我的眼睛，逐字地读了几遍，用力地记住。过了不久，它们的具体内容全都忘光，但那带韵的优美文字所表达的当时农民对解放后新生活心满意足的情绪、对更美好日子的向往，却因激发起我的共鸣而深深地印在脑海。这年年底，我在蓟县城关大刀剪营蹲点搞建团工作，当了新创刊的《河北青年报》的通讯员，懂得了报刊上的稿子可以由普通的人写了邮去发表，于是我就模仿着大庙墙报上那几篇散文的格局，写开了诗歌。过了几个月我转到灾区工作，那里的领导为了宣传生产自救，让编写个小戏，我就大着胆子干起来。我不光自己编，还参加演出，取得出乎预料的效果——这使我认识到写作的重要性，是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发动群众的武器，同时也增强了学习写作的信心。

编写小戏，是我学习写作的开始，一开始写作就兴致勃勃；农民的心气向上，新鲜事比比皆是，鼓舞我把它们写下来；开展工作的需要，更是我不计得失、有嫌苦累、不怕吃败仗和丢脸的动

力。我写了小诗歌，就抄写在乡间的黑板报上；写了小通讯，就爬到树上或屋顶上，用铁片焊的喇叭向农民广播；写了小故事，就在开群众会，特别是青年多的民校课堂上去念和讲。这其中凡出现了自己认为好一些的稿件，也寄给报社；反正不花邮票钱，也不抱能入选的奢望，所以一点精神负担都不曾有。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的《河北青年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题为《姐姐进步了》的小通讯，约计有一千一百多字。这是我头一回把手写的稿子变成铅字。

为推动革命工作，为宣传群众，而不是为名为利而写作，是五十年代盛期成长起来的大批青年作家，尤其是工农出身的作家一个显著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借助时代的气候雨露，让自己壮大起来。这应当视为好的传统，珍惜它，发扬它！

五

象我这样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身居僻野山村，连“作家”这种名称都不曾听说过的农民的子孙，能够爱上写作，能够搞起写作，并以它为终生的职业，如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苦人搞革命，政治上得解放，经济上闹翻身，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如我常说的。连做梦都没有做到当作家！

当然，什么种子才能发什么芽。追根溯源，我仿佛是一棵“文艺的种子”。这同样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造成的。

幼年贪玩逃学的时候，有一次被妈妈察觉，对我们姐弟两个做过一次“三娘教子”式的规劝。那会儿，我跪在地下，满心痛苦和恐惧，只盼着惩罚快点结束。妈妈一边哭啼一边数叨的话，几

乎没有听进耳朵，只是有一种意思，至今还依稀地记得。她告诉我们，我们的父母不识字，我们的祖父母不识字，外祖父母，以及姑姑舅舅都不识字，所以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气，一生一世没有个出头之日。拄棍子要饭吃，也要让我们成为读书识字的有本领的人。

不是妈妈——一个在旱店子村给财主家看坟人家的女儿具有这样的见识、愿望和决心，我连三年半小学都念不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孤儿寡母，拾一篮子煤核也是好的，我哪有半点念书的权利！

这三年半小学的底本可太重要了，以后我开始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和哺育，从练习写作到入门，无不借助于它。

“燕春楼”那狭小、黑暗的舞台上，评剧艺人通俗易懂的艺术表演，首先让我这穷孩子跟艺术有了缘份，给我上了艺术的第一课。因为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一些主要戏目，如《杜十娘》、《花为媒》、《茶瓶计》等等，我几乎能从头到尾地唱一遍。紧接着因爸爸逝世，母子三人相依为命，片刻不离地厮守在一起。在窗前月下，或是炕头上的火盆旁，听妈妈讲述她小时候听来的，或者自编杜撰的民间故事。这使我接受到有别于舞台表演艺术的另一种叙述文学，开了一条吸取营养的新源泉。到了农村，只有一年一度的庙会才能看戏，民间口头文学成了主要的精神享受。在上山的路上，在打更的房子里，在歇晌的村头树荫下，我总是千方百计地缠住别人给我讲故事听；把本村和邻村一些相识者肚子里的“古迹”，都让我给掏出来了。妈妈死后，我又成了驴皮影的酷爱者。那种纯属民间的艺术，很适合农民的口胃，对小孩子尤